

从敦煌吐鲁番学看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

陈 国 灿

敦煌吐鲁番学,是研究敦煌、吐鲁番等地发现、保存下来的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的学科。其内容包括大量的历史文书、石窟艺术、古城遗址、古墓葬及其器物等等,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形象、具体的内容和精神。透过先民们世代创造的这些历史文明的遗存,今天仍能使人感到这些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作用。

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保守的民族,在不同的时期,都曾有过寻觅、吸收新文化来丰富充实自己的历史。两汉时期向西域的发展;丝绸之路的开凿与形成;唐宋以来海上交通的繁盛,都反映了本民族对异域文化的渴求。从西周的《穆天子传》到唐代的《大唐西域记》、到明代的《殊域周咨录》,无一不反映先民们对域外世界寻觅的实践和认识。民族的这种求发展的渴求,曾掀起过一股又一股吸取域外文化的新浪潮。敦煌、吐鲁番文化正是中国中世纪这种浪潮中浮现出来的花朵。

文化贵在交流,历史上的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域,总是在交流中求得进步、发展自身的。在罗盘针尚未发明以前的古代中国,与外部世界的交流,主要靠陆路交通,这就是著称于世界的丝绸之路。那时的整个世界,大体上受着四大文化体系的支配,在东方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作为礼义之邦的中华文化,在南亚有佛教之乡的印度文化,在西方有重人文主义的希腊文化和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化。这四种文化在古代,都是靠丝绸之路这条东西交通大动脉在流动、交汇和相互影响、渗透。而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枢纽的敦煌、吐鲁番,则成了这几种文化碰撞、交汇的中心,许多外部世界的文化,都由这里涌进了中华大地。

在物质文化方面,新的物种、技术,通过这里不断被中华大地所吸收。原不产于中国的棉花,约在5世纪传到了高昌(今吐鲁番),以“白叠子”之名在这里普遍开花,后来竟成了中国广大民众最基本的衣着原料。今天遍及全国的葡萄,也是由中亚输入,后在吐鲁番、敦煌生根结果。葡萄可酿酒,前凉时敦煌人张斌专门为此作《葡萄酒赋》,唐朝大军进驻高昌,又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,唐太宗亲自监督酿制,居然酿出各具色彩的葡萄酒,酒成后,“颁赐群臣,京师始识其味”,这是西域酿酒法在中国的新发展。芝麻,古称胡麻,蚕豆古称胡豆,核桃古称胡桃,均由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到中国,这些作物一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,其栽培方法也随着中国土质、气候的不同而有变化,其名称也中国化了。在敦煌所出唐代文书里,保存着印度甘蔗种类及其榨糖、造沙糖法,这是印度制糖工艺传入的结果。在吐鲁番出土的古代织物里,有波斯锦、疏勒锦,这是中国蚕桑流传至西域、捣茧成绵,然后以丝绵作纤维进行织造的另一种工艺,此工艺后又返传至吐鲁番,织造出可与波斯锦媲美的“高昌锦”。这些外来的物质文明,丰富了中国先民的生活,推动了社会的进步。

在精神世界里,印度佛教由中亚经吐鲁番、敦煌传到中原,东汉以后、历魏晋至隋唐,

广为中国民众所信奉，这与众多的中、外僧侣将佛经传到中国后，用中国的语言、理念和传统习俗加以传播有关。敦煌、吐鲁番是这一精神文化的重要转输站，因而也留下了深深的佛教文化的烙印，而当这种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、伦理思想相揉合时，也就变成了中国式的佛教了。此外，盛行于古代欧洲的景教(基督教)、初建于波斯及后流行于地中海沿岸的摩尼教、创建于波斯并盛行于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也纷纷传入中国，在敦煌、吐鲁番都有它们的教义、经典和寺祠，由这里又传到长安、洛阳。域外的这些宗教东传后，在中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，琐罗亚斯德教被称为祀胡天、胡天神，由此新创制了“袄”字，被称为“袄教”或拜火教。摩尼教在中原一旦被中下层群众所接受，便变成了中国受苦群众反抗黑暗势力的斗争工具，如南宋方腊起义即以此教教义为号召，被称为“食菜事魔教”。

随着佛教的东传，域外的音乐、舞蹈、美术及其它工艺等也相继传到中国。可是，来到吐鲁番、敦煌后，又无一不受到中国固有文化的熏染，这种特征在敦煌莫高窟、榆林窟、在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洞窟、吐峪沟千佛洞、从精美的佛教壁画到图案纹饰、从彩绘雕塑到龕檐建筑，几乎到处呈现出来。比如敦煌飞天，并非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羽人，它从西域飞来，是佛经中的天歌神，或称伎乐天，传到敦煌后，在洞窟壁画中表现出来的形象，更多地变成了挥动长巾、曳带彩云、“飘飘九霄外、下视望仙宫”的仙女，甚至出现双人飞天、天歌神形象大环形飞天，身穿各种服饰，面带各种表情，它不仅中国化了，而且世俗化了，与印度原有的异其趣。可以说，敦煌飞天是中国先民对古代传统羽人进行改造的基础上，吸取印度飞天艺术营养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艺术造型、充满中国民族意识的新飞天。它既体现了印度佛教教义，又充满汉民族的传统智慧和艺术风格。这样一种吸收外来文化、对原有文化进行新的改造、创造出一种清新风格文化的优良民族传统，正是今天对我们有用而应该继承的。

由上所论，我们一方面看到，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对外来文化不仅愿意吸收，而且善于吸收，能很快地将域外文化与本民族的特点和需要结合，运用自己的智慧进行再创造，使之变为本民族的东西。另一方面也表明，任何外来文化，如果不与中国自身固有传统特点相结合，就不可能得到广泛传播；如果不与中国自身时代的需要相结合，也就不会有生命力。

古代的中国，一直处在世界先进文化前列，这必然也使她的文化远播域外，这在敦煌、吐鲁番文化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因为在丝绸之路繁盛的古代，敦煌、吐鲁番既是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，也是国际性的经济、文化交流城市；既是域外文化输入的窗口，又是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基地。丝绸是闻名于世的中国传统出口产品，甚至蚕桑养殖技术、纺织工具及染织技艺也输往西域。在阆早期的遗址里，有描绘着汉朝和亲公主将蚕子藏于帽中输往于阆的板画，对于阆说来，这位汉族公主是先进技术的传播者，被奉若神明。这一早期的西域故事，虽具传奇色彩，却反映了中原蚕桑丝织生产技术的西传，尽管封建统治者有各种限制、禁令，然而中国的先进技术和发明创造仍然冲破了国界，贡献于世界。灿烂的中国文明，吸引着众多西域胡商的东来，正是这些交错来回于丝路上的中外商旅、僧人、使节，将这些文明的成果传往西方。吐鲁番出土的隋唐时期织锦，有许多织纹是波斯萨珊朝时期的图案，如联珠纹圈内有对禽、对兽图，中间还夹织着汉字“吉祥如意”等祝语，显然是专供外销而织造的。此外，中国的造纸技术、雕板印刷术、医药、医经、农学、数学、历法、星象学、建筑学、语言学、文学等各类著作和知识，也都通过这里向外传播。在敦煌、吐鲁番古文书里，发现有译成多种民族文字的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等中国典籍。在6世纪高昌(今吐鲁番)的一份收纳市场交易税的官府帐本上，可以看到金、银、药材、香料、生丝等物出口的数量。在8世纪交河郡(今吐鲁番)的市场价目表上列有中原各种物产的价格，如蒲州(今山西蒲州)、

陕州(今河南三门峡市)的绳、河南府(治今洛阳)的生绳、梓州(今四川三台)的小练、常州的布、益州(今四川成都市)的成衣、南方的竹笋……等等,品名分类之细,不亚于当今,内地物产齐集于此,大都是为了出口交换。

中国先民们的劳动智慧、先进技术以及思想意识、精神财富和各种物产就是这样由敦煌、吐鲁番一步步地转向中亚、走向世界,给世界文明的发展增添了智慧之光,这是古代中国对人类文明作的贡献,也反映了中国先民们不仅愿意从世界引进、吸收,而且愿意给予、奉献于世界的优良传统,反映了古代中华文明的辐射作用。这种传统和作用,正有待于我们发扬光大。最近,南朝鲜三星物产公司副经理李吉铉在探索南朝鲜的生存道路时主张:“今后将要走‘逆丝绸之路’,过去从中国流入韩国和日本的东西和文化,现在应反过来从日本经韩国传到中国,甚至近东、东欧、苏联”。这种由总结历史提出的挑战性的结论,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?历史的反思,将会唤起我们对世界承担的历史责任,也会有益于现代化的进程。

在敦煌、吐鲁番文化中,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可贵的民族精神。早期在这里呈现出来的是开发性文化,汉代以前这里曾是游牧民族出没的地方,到了汉代,中原人民开始在这里经营开发。敦煌距长安4千余里,吐鲁番距长安5千余里,中隔戈壁和沙漠,交通极为不便,拓荒者们不畏艰险、克服万难,年复一年,一代又一代,终于开发出这块绿洲,并在此安营扎寨,使这里逐步赶上中原文明的水平,创造出辉煌的敦煌、吐鲁番文化来。先民们这种艰苦创业、勤劳勇敢的开拓精神,一直被后代子孙所敬仰、传颂。

在敦煌、吐鲁番文化中,佛教文化占有较大的比重,先民们对佛的信仰、献身于佛的事业是其特点之一。透过这一特点,我们看到了先民们的坚韧性和献身精神。为了往西域、天竺求法取经,一批批僧人们不畏艰难地来到这里,然后又西涉流沙、过戈壁,为着事业和信念,置生死于度外,顽强前进,直抵佛祖之乡。取经归来后又一字一句、年复一年地将诸经译释、抄写、使之广为流传。为了开凿洞窟、塑绘佛像,连续数年,锲而不舍,数百年间,居然凿出上千座洞窟来。信徒和僧人们为着普渡众生、广修功德,一代代进行了无数次虔诚写经,以致在莫高窟内藏有数万卷之多。尽管他们把勤劳和智慧贡献给了虚无的来世,然而这种对事业的认真态度、顽强的追求精神,对信念的坚韧不拔和献身精神,却体现了我们民族固有的美德,直到今天仍给人以力量,令人肃然起敬。

敦煌、吐鲁番文化,也有着自身特有的曲折历史,这里地处西域门户,民族斗争不断。敦煌曾沦陷于吐蕃统治60余年,然而传统的汉文化不仅没有泯灭,反而起了凝聚汉族人民的作用,居民们用儒家思想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共识,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抗斗争,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,靠着自立的斗争,终究赶走吐蕃统治者,建立“归义军”政权,从而改变了屈辱地位,坚持了中原文化传统,使中华传统文化在大西北这块偏远的绿洲上一直承袭下来。这种反抗压迫的斗争和自力更生精神,也是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在这一地区的体现,十分可贵。

从敦煌、吐鲁番文化发展的道路中总结出来的勤劳勇敢的开拓精神、坚韧顽强的献身精神、不甘屈辱的反抗精神和自力更生的自主精神,都是我们民族灵魂的体现,这种民族魂,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,如果在今天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加以发扬和提倡,无疑将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。

敦煌、吐鲁番文化,今天仍为世界所瞩目,因为它保存了人类文明丰富的遗产。这里有丰富的石窟艺术,就人们熟知的莫高窟看,在现编的492个佛窟中,有着十六国至宋、元时期的佛本生画、佛故事画、还有各种社会生活画、史迹人物画、生产画。从佛到人、人间天上,内容生动丰富,壁画璀璨夺目,凝聚了上千年间匠人们的智慧、创造和劳动,展现了中国

传统艺术的演变规律，并直接关系到现代艺术的发展道路。许多海内外的美术家、音乐家、舞蹈家长途跋涉到此“朝圣”，将此地当作吸取中国传统艺术营养的课堂，正是为了继承发扬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传统。

在敦煌、吐鲁番的古文化宝库里，有为数众多的古写本，除汉文外，还有吐蕃文、回鹘文、于阗文、梵文、吐火罗文、粟特文的写本。尽管大部分是佛经，但也有不少著述、典籍、日常事务记录、官私档案等。它既记载了当时人们的活动、思维和交往，也反映了当时整个西域的情况。如汉文写本《西天路竟》，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僧慧超用汉文写的《往五天竺传》，便记述了中、印陆上交通以及印度古代的风土民情、人物制度、文化传统等，这些记录在印度今天是无法找到的，加上众多的印度佛教经典、僧人著述、口头传说、作品等，大都在印度失传了，而在敦煌较好地保存着。印度驻华大使任嘉德说：对这些丰富的资料，他们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，组织不同领域的学者来进行分学科的研究，他们面临着挑战性的任务。

在敦煌、吐鲁番宝库里，有吐蕃文写的《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》，概述了9世纪前后从西伯利亚到中亚、直到欧洲的政治统治状况。许多用回鹘文写的摩尼教经典及其传播的记录，以及汉文中保存的早期景教经典、东传的记录，袄教教义及传入中国的记载，于阗文写的《使河西记》及众多的于阗文献，一些现在消失而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民族及其文化，以及内容繁富的汉文各类写本，无一不引起世界学者们的关注和兴趣。在法国巴黎国家科研中心，有专门的“敦煌研究组”。在东德科学院有“吐鲁番文献研究组”。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东方研究所里有“敦煌特藏研究组”。在日本，类似的学术团体和学者则更多，50年代有过“西域文化研究会”，现在在东京东洋文库有“敦煌写本研究委员会”，大东出版社有“敦煌讲座编纂组”，在京都“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”。在英国、匈牙利等都有专门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。他们力求从中发掘人类的古代文明，研究古代的西方从东方吸取的文明营养和变异、以及它们对现代生活的作用，找寻古代东西方的交往、共存与平衡关系，尽可能地让埋没了上千年的敦煌、吐鲁番文化实现其在当代人类文明建设中的价值，这正是敦煌、吐鲁番学今天在国际上成为一门显学的根源。

许多外国学者说：“敦煌、吐鲁番在中国，敦煌、吐鲁番学的研究在全世界”。他们为中国有敦煌、吐鲁番这样的宝库和别具特点的文化艺术来填补人类文明史而振奋、自豪。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说：“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佛教艺术最伟大的宝库，她属于中国人民，也属于全人类。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”。1988年8月，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，印度驻华大使任嘉德发言说：“我们两国传统的智慧引导我们建设自己的社会文化队伍，可继续用之来实现我们的现代化。完全抛弃传统文化，既不明智、也不必要。我们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有现代意义，难道说古人那种不畏艰难、推心置腹、取长补短的精神；那种诚心诚意友好合作的交往在今天不能发扬光大吗？我看是可能的”。这是对敦煌、吐鲁番学中的传统文化带国际性眼光的评价，很值得我们在认识本民族传统文化时加以认真思考。

综上所述，敦煌、吐鲁番学中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既有对今天现代文明建设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化内容，又有许多反映我们民族优秀品德、性格的民族灵魂和精神，这些都值得今天加以珍惜、继承和发扬。我们不是虚无主义者，我们历史上有许多闪烁光辉的东西，很需要将它拿来为民族的振兴、现代化的建设增加新的热度，同时在总结、吸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更新的中华文化来。先民们在千年以前曾通过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作出过杰出的贡献，今天，作为11亿人口的中国人民，更应该用自己的中华新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。